

中国古文献学研究

古代辨伪学概述（中）

孙钦善

隋 唐

隋及初唐，在文献学上的特点是集成而少开创，多因袭、曲徇旧文、旧义，在辨伪学上很少建树。即以《尚书》为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：“梁、陈所讲，有孔（按：即伪孔，下同）、郑二家，各代唯传郑义。至隋，孔郑并行，而郑氏甚微。自余所存，无复师说。”由此可见，南朝时伪孔与郑玄两家尚能平起平坐，至隋，伪孔已占绝对优势。入唐，亦不重辨伪。唐初所修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在著录群书时，多注存亡，而绝少辨真伪。当时对伪《古文尚书》亦深信不疑。至孔颖达等人作《尚书正义》，固然对《尚书》诸本的真伪问题难以迴避，在疏中不得不加以论辨，但颠倒是非，以伪为真，以真为伪，致使谬种流传，千载不已。具体情况，前已引述。

刘知几（661—721）继承王充的疑辨精神，在唐代首倡辨伪。他于唐中宗景龙四年（710）写成《史通》，其中《疑古》《惑经》两篇是辨伪说之作。《疑古》就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等书提出十疑，指明古人由于史料缺略或出自偏见而对史实的歪曲。在《惑经》中对经书提出质疑，如指出孔子所删定的《春秋》，“未谕者有十二”，“虚美者有五焉”，认为孔子歪曲历史，“多为贤者讳”，与“庸儒末学文过饰非”一样。刘知几亦留意书籍辨伪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载：“开元初

迁左散骑常侍，尝议《孝经》郑氏学非康成注，举十二条左证证其谬，当以古文为正；《易》无子夏传，《老子》书无河上公注，请存王弼学。宰相宗璟不然其论，奏与诸儒质辩。博士司马贞阿意，共黜其言。请诸家兼行，惟子夏《易传》请罢，诏可。”其辨子夏《易传》、《老子》河上公注之伪，甚是（《唐会要》载刘知几辨河上公注《老子》的具体言论，可参）。辨郑注《孝经》之伪，亦是。然《古文孝经》乃隋时伪託之作，不当信。

时至中唐，独立思考、质疑辨伪的风气更为普遍，辨伪学衰而复兴，实滥觞于此。

首先有陆淳本啖助、赵匡之说，作《春秋集传纂例》、《春秋微旨》、《春秋集传辨疑》，对《左传》的作者和内容多所辨正，认为《左传》非左丘明所作，左丘明为孔子“以前贤人”，左氏当为另一人，此说有见地。然啖、赵、陆三人完全否定春秋三传，则属偏激之论。

柳宗元（773—819）辨疑群书，特别是在辨诸子书方面，成就突出。本集卷四有《辩列子》、《辩文子》、《论语辩》二篇、《辩鬼谷子》、《辩晏子春秋》、《辩亢仓子》、《辩鶡冠子》等，皆为辨伪专篇论著，无论在所辨内容及辨伪方法上均有开创。在辨作者方面，如《论语辩》认为《论语》“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，余是以知之，盖乐正子春、子思之徒与为之尔。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，然而卒成其书者，曾氏之徒也。”此说甚确。在辨内容方面，如《辩列子》说：“其《杨朱》、《力命》，疑其杨子书。其言魏牟、孔穿，皆出列子后，不可信。”《辩文子》云：“其旨意皆本老子。然考其书，盖驳（杂）书也。其浑而类者少，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。凡孟、管辈数家，皆见剽窃，峣然而出其类。其意绪文辞，又牙相抵而不合。不知人之增益之欤？或者众为聚斂以成其书欤？”并且在辨伪时已能综合运用多种方法。如《辩鬼谷子》：“汉时刘

向、班固录书无《鬼谷子》。《鬼谷子》后出，而险整峭薄，恐其妄言乱世，难信，学者宜其不道。”此从著录及内容综合考察。《辩亢仓子》：“太史公为《庄周列传》，称其为书，《畏累》、《亢桑子》，皆空言无事实。今世有《亢桑子》书，其首篇出《庄子》，而益以庸言。……刘向、班固录书无《亢仓子》，而今之为术者，乃始为之传注，以教于世，不亦惑乎！”此从著录、取材两方面综合考察。另《辩晏子春秋》还着重从思想上分析，认为“墨好俭，晏子以俭名世”，“且其旨多尚同、兼爱、非乐、节用、非厚葬久丧者，是皆出墨子。又非孔子，好言鬼事；非儒、明鬼，又出墨子”，“盖非齐人不能具其（指晏子）事，非墨子之徒，其言不若是”，故“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”。此说后人有从之者，如胡应麟《四部正讹》、梁启超《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》；亦有非之者，如孙星衍《晏子春秋序》。虽尚难成为定论，但柳宗元以思想体系为根据进行辨伪，颇具开创精神，而且能言之成理。柳宗元在辨伪学史上已开辨群书之先河，且意见精当，方法多样，故对后世影响很大。胡应麟《四部正讹》在《鹑冠子》一书下对他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：“若抉邪摘伪，判别妄真，子厚之裁鉴，良不可诬。所论《国语》（按：有《非国语》）、《列御寇》、《晏婴》、《鬼谷》，皆洞见肝膈，厥有功斯文，亦不细矣”。

两 宋

两宋的辨伪学，继中唐重兴之端绪，更加广泛、深入地发展起来，无论新学还是旧学，无论义理学派还是考据学派，没有不涉及辨伪的。

关于北宋疑古辨伪的情况，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八“经说”中有一段讲得最为清楚：“自汉儒至于庆历间，谈经者守训

诂而不凿。《七经小传》出而尚新奇矣，至《三经义》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。……陆务观(游)曰：唐及国初学者，不敢议孔安国、郑康成，况圣人乎！自庆历后，诸儒发明经旨，非前人所及；然排《系辞》，毁《周礼》，疑《孟子》，讥《书》之《胤征》、《顾命》，黜《诗》之序，不难于议经，况传注乎！’斯言可箴谈经者膏肓。”对这段话应一分为二，其对宋人由轻率疑古而发展到穿凿作伪的批评是恰当的，但对他们勇于议经辨伪的指责则欠妥当。下面就这段话的内容稍作解释。

《七经小传》为刘敞(1019—1068)所作，关于《尚书》二十二条，《毛诗》三十五条，《周礼》四十一条，《仪礼》四条，《礼记》三十一条，《公羊》、《国语》三条，《论语》八十六条，议汉、魏、晋人旧说，有辨伪之精辟见解，如怀疑《诗序》。但亦多穿凿之辞。

《三经义》指《诗义》、《书义》、《周礼义》，为王安石(1021—1086)及其子王雱所撰(按：《诗义》、《书义》已亡，他书有佚文。《周礼义》有出自《永乐大典》之辑本)。他们注这三部书，目的在于为推行新法制造理论根据。特别是王安石手定之《周礼义》，明显是附会经义，推行新法，故多影附穿凿之说，以致后人有经义乱于王氏之论。但王氏说经，也并非处处附会，一无是处，正如《四库提要》卷十九说：“安石解经之说，则与所立新法各为一事。程子取其《易解》，朱子、王应麟取其《尚书义》，所谓言各有当也。今观此书，惟训诂多用《字说》，病其牵合。其余依经诂义，如所解‘八则治都鄙’，‘八统之驭万民’、‘九两之系邦国’者，皆有发明，无所谓舞文害道之处。故王昭禹、林之奇、王之与、陈友仁等注《周礼》，颇据其说。

所谓“排《系辞》，毁《周礼》”，指欧阳修(1007—1072)而言。欧阳修是宋代第一个重视辨伪的学者。他著有《易童子问》(见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)，辨《周易》中《系辞》、

《文言》以下非孔子所作，破传统伪说，甚是。但又说《周易》经文及《彖》《象》是孔子所作，这是不对的。其毁《周礼》之语，见《问进士策》（见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），继汉武帝、何休怀疑之论，根据内容进一步质疑，推翻《周礼》反映周制、成书于周代之旧说。

毁《周礼》的还有苏轼（1037—1101）、苏辙（1039—1112）。苏轼《天子六军之制》说：“其言五等之君，封国之大小，非圣人之制也，战国所增之文也。……先儒以《周礼》为战国谋阴之书，亦有以也。”（见《东坡续集》卷九）苏辙《历史论·周公》说：“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，莫详于《周礼》；然以吾观之，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，非周公之完书也。”接着列举三点证明《周礼》不可信。

所谓“讥书”，亦与苏轼有关，他撰有《书传》，认为《胤征》写羿篡位、挟天子令诸侯之事，《康王之诰》（今传《尚书》，此篇从《顾命》析出，故陆游原话称《顾命》）记康王脱丧服而穿礼服，以命群公为非礼，与旧说不同。能据事实及礼制加以考辨。

所谓“疑孟”，涉及李觏（1009—1059）和司马光（1019—1086）。李觏撰《常语》（见《盱江集》卷三十二），中多疑《孟子》之言（今传《盱江集》中仅余三条）。司马光撰有《疑孟》（见《司马温公文集》卷七十七）。二人之说均属一般非议之论。

所谓“黜诗之序”，指晁说之。他撰有《诗序论》四篇（见《景迂生集》卷十一），辨《诗经小序》之伪说。

至南宋，辨伪学更进一步发展。南宋初年，首先有吴棫（？—1154）发难辨《古文尚书》之伪，著有《书稗传》十三卷，不传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谓：“卷首举要：曰总说，曰书序，曰君辨，曰臣辨，曰考异，曰训诂，曰差互，曰孔传，凡八篇，考据详博。”阎若璩《尚书古文疏证》卷八搜

集了他的一些言论，既辨书序，又从语言、史实上辨《古文尚书》之伪。

同时有郑樵（1102—1160）著有《诗辨妄》，专驳毛郑之失，且疑《小序》。书已佚，顾颉刚有辑本。《文献通考》录樵此书自序云：“今学者只凭毛氏，且以序为子夏所作，更不敢疑议。盖事无两造之辞（按：指三家诗废，毛郑独行），则犹有偏听之惑，今作《诗辨妄》六卷，可以见其得失。”郑樵集毕生精力于编撰《通志》一书，二十略中的《校讎略》，专论群书的校理与分类，为校讎学有专书之始，但疏于书籍真伪的考辨，如《亡书出于后世论》、《亡书出于民间论》两节，多将依托新造之伪书（如《连山》、《三坟》）视为亡书复出。故胡应麟《四部正讹》就其尊信《三坟》书说：“甚矣，郑之疏略也。”

南宋考据家洪迈（1123—1202），辨伪学上有突出贡献，成果见于所著《容斋随笔》。在辨伪书方面，如《容斋三笔》卷十有《孔丛子》一条，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不见著录，文章“略无楚汉间气骨”，与颜师古注《汉书·艺文志》辨世传《孔子家语》之伪相类比，以证其伪。又如《容斋三笔》卷十五《别国方言》条，考《方言》非扬雄所作：“今世传扬子云《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》，凡十三卷，郭璞序而解之。其末有汉武帝时刘子骏与雄书从取《方言》，及雄答书。以予考之，殆非也。雄自序所为文，汉史本传但云：‘经莫大于《易》，故作《太玄》；传莫大于《论语》，作《法言》；史篇莫善于《仓颉》，作《训纂》；箴莫善于《虞箴》，作《州箴》；赋莫深于《离骚》，反而广之；辞莫丽于相如，作四赋。’雄平生为文，尽于是矣，初无所谓《方言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……亦不载《方言》。观其《答刘子骏书》，称‘蜀人严君平’按君平本姓庄，汉显宗讳庄，始改曰严。《法言》所称‘蜀庄沈冥，蜀庄之才之珍’，‘吾珍庄也’，皆是本字，何独至

此书而曰‘严’，……既云成帝时子骏与雄书，而其中乃云‘孝成皇帝’，反复抵牾。又书称‘汝颖之间’，先汉人无此语也。必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云。”此从本传自叙著作、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、避讳、称谥、语词等方面证《方言》之伪托。这说明洪迈在辨伪方法和条例上已颇周密，反映了当时辨伪学的进步。特别值得指出的是，洪迈还注意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辨伪订讹。如《容斋三笔》卷十二《钟鼎铭识》一条，用铜器铭文印证商周文献，并对汉人轻视有款识之器提出非议。又《牺尊象尊》条，用当世“所存故物”及宣和《博古图》所绘图样，证“牺尊纯为牛形，象尊纯为象形，而尊在背”，驳汉儒“牺尊饰以翡翠，象尊以象凤凰或曰以象骨饰尊”之伪说。

朱熹（1130—1200）是理学家，在辨伪学上也卓有成就。因为他不同于一般理学家，也重视考证，因此他的辨伪，在论断上较为实在有据。

他继吴棫之后，进一步怀疑伪《古文尚书》及伪孔传，在《语类》及《文集》中议论甚多。如在《朱子语类》中他对孔安国传及书序之伪深信不疑，认为孔安国传为魏晋间人托名而为，《尚书序》“文字软善，西汉文字则粗大”。对伪《古文尚书》则信疑将半，一方面承认“伏生书（今文）多艰涩难晓，孔安国壁中书却平易易晓”，同时又说：“《书》有两体，有极分晓者，有极难晓者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。故《尚书古文疏证》卷八第一百十四条说：“其于古文似犹为调停之说”。对《诗经》，他继刘敞之后怀疑《诗序》，《朱子语类》中有不少言论。另著有《诗序辨说》云：“《诗序》之作，说者不同，或以为孔子，或以为子夏，或以为国史，皆无明文可考。惟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以为卫宏作《毛诗序》以传于世，则序乃宏作明矣。”对于诸子亦多所考辨，如认为：“《管子》非管仲所著，……其书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，并附以他书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对于当

世所造伪书，朱熹不但多加甄辨，有的还作实地考察，如说：“今之伪书甚多，如镇江府印《关子明易》并《麻衣道者易》，皆是伪书。《麻衣易》正是南康戴绍韩所作。昨在南康观其言论，皆本于此。及一访之，见其著述，大率多类麻衣文体，其言险侧轻佻，不合道理。又尝见一书名《子华子》，说天地阴阳，亦说义理人事，皆支离妄作。至于世传《繁露》、《玉杯》等书，皆非其实。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验，古文自是庄重。”

（《朱子语类》）朱熹在辨伪方法上亦有所总结，《答袁机仲（枢）》曰：“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，所以能别其真伪者，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，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、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真以臆度悬断之者也”（《文集》卷三十八）这里方法之一是本书的思想内容，方法之二是旁证，包括作者，篇章分合、文字风格等等。所辨书籍遍涉经史子集，多达五十余种。

与朱熹同时的叶适（1150—1223），著有《习学记言序目》。这是一部阅读、评论经、史、子群书的札记，其中时有辨伪的内容。

在朱熹的后学中，黄震（著有《黄氏日钞》）、王应麟（著有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、《困学纪闻》）等皆以考据见长，亦善辨伪。

宋代辨伪学的发展，也影响到目录学。北宋《崇文总目》，已见辨伪语，继承了中断已久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原有的辨伪传统。至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，高似孙《子略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辨伪已成为书籍解题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元 明

元明辨伪，特别是明代，继宋之后，又有进一步发展，辨伪专著开始出现，成为我国古文献学史上辨伪理论确定的时期。

元吴澄，继吴棫、朱熹之后，辨世传《古文尚书》之伪，其说有发展，见《尚书纂言》。

元末明初的宋濂（1310—1381），入明后曾主修《元史》。入明之前，于元顺宗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写了一部评论考辨诸子书的《诸子辩》（一名《龙门子》，收在本集中）。就专辨诸子书（先秦至宋共40种）而言，这还是辨伪学史上的第一部。此书多袭前人（如柳宗元、高似孙、朱熹、黄震等）之说，但亦有辩驳和独创。如《亢仓子》一书，自柳宗元起，屡有辨伪之作，宋濂能独立思考，提出新证：“《亢仓子》五卷，凡九篇，相传周庚桑楚撰。予初苦求之不得，及得之，终夜疾读，读毕叹曰：‘是书伪也，剿老、庄、文、列及诸家言而成之也！’其言曰：‘危代以文章取士，则剪巧绮滥益至，而正雅典实益藏；夫文章取士，近代之制，战国之时无有也。其中又以‘人’易‘民’，以‘代’易‘世’。世民，太宗讳也。伪之者其唐士乎？予犹存疑而未决也。后读他书，果谓天宝初，诏号《亢桑子》为《洞灵真经》，求之不获；襄阳处士王士元采诸子文义类者撰而献之（按：唐人已有此说，见《孟浩然集序》，这里“他书”指《郡斋读书志》）。其说颇与予所见合。”其中有袭他书之说，但从典制、避讳方面提出证据，乃作者创见。他还注意作伪和辨伪的规律，如辩《言子》说：“大抵古书之存于今者多出于后人之手”，或依傍他书，“有以附丽”，如《孔子家语》等，或“凿空扇虚以惑世”，如《三坟》、《阴符》等。

明代考据家如杨慎（1488—1559）、焦竑（1541—1620）在他们的考证笔记中皆有辨伪的内容。前者有《谭苑醍醐》，后者有《焦氏笔乘》。

梅鷟（生卒未详，明正德八年举人）著有《尚书考异》（又有《尚书谱》，内容略同），此书是上承宋吴棫、朱熹，元吴澄，下启清代阎若璩、惠栋、丁晏等人的一部《古文尚书》的辨伪名著。此书无论对考辨世传《古文尚书》之伪，还是对古籍辨伪的一般方法，都有独特的贡献如“大禹谟”一节说：“变乱圣经之体者，《大禹谟》是也。凡伏生书（今文），典则典，谟则

谟，誓则誓，典、谟、誓杂者未之有也。今此篇自篇首至‘万世永赖，时乃初功’，谟之体也；自‘帝曰：格汝禹，至‘率百官若帝之初’，典之体也；自‘帝曰：咨禹惟时有苗弗率’至‘七旬有苗格’，誓之体也。混三体而成一篇，吾故曰变乱圣经之体者，《大禹谟》是也。……”此从文章体例上考察，以揭示作伪之痕迹。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一节说：“‘允执厥中’，尧之言也，见《论语·尧曰第二十》。夫尧之一言至矣，尽矣，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，先儒以为所以明乎尧之一言，必如是而后庶几也。自今考之，惟‘允执厥中’一句信为圣人之言，其余三言盖出《荀子》，而钞略掇拾胶粘假合之者也。《荀子·解蔽篇》曰：‘昔者舜之治天下也，不以事诏而万物成，处一之危，其荣满侧；养之一微，荣矣而未知。《道经》曰：‘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。’危微之几，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。’荀子称《道经》曰，初未尝以为舜之言。作《古文》（尚书）者，见其首称舜之治天下，遂改二‘之’字为二‘惟’字，而直以为大舜之言。……至于‘惟精惟一’，则直钞略荀卿前后文字而攘以为己有，何哉？所谓伯宗攘善，其无后乎？《荀卿子》上文有曰：‘心者，形之君也，出令而无所受令’，故曰：‘心容其择也无禁，必自见，其物也杂博，其精之至也不貳’；又曰：‘心枝则无知，倾则不精’；又曰：‘有人也不能精于田、精于市、精于器之三技，而可使治三官，曰：精于道也’。下文有曰：‘好义者众矣，而舜之独传一也’，‘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之者者’。又曰：‘蚊虻之声，闻则挫其精，可谓危矣，未可谓微者也’。此其‘精’字、‘一’字之所自来也。”这里抛根究底，直探作伪者依傍之本源，篡改之痕迹。又如揭露孔传注释《禹贡》地理之误说：“灋水出谷城县，两《汉志》（前后《汉书》之《地理志》）并同，晋始省谷城入河南，而孔传乃云出河南（县）北山；积石山在西南羌中，汉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，而孔传乃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。孔安

国卒于汉武时，载在《史记》，则犹在司马迁以前，安得知此地名乎？”这里从地理沿革上考察时与地之矛盾，以证孔传作于汉后，实为伪托，证据确凿。以上证据皆为阎若璩所取。

晚明的胡应麟（1551—1602），在宋濂、杨慎等人的直接影响下，总结发展前代辨伪的成果和经验，著成《四部正讹》一书。此书把考辨范围扩大到四部（涉书六十六种及讖纬、诗话诸书，仍以诸子书为多），不仅在诸书考辨上有不少卓见，而且更重要的在于系统地归纳了作伪的复杂情况，总结了辨伪的各种方法，成为我国辨伪学发展成熟的标志。具体情况前已引述。另外，作者对四部书中伪书众寡的不同情况有具体分析：

“凡四部书之伪者，子为盛，经次之，史又次之，集差寡。凡经之伪，《易》为盛，纬侯次之。凡史之伪，杂传记为盛，琐说次之。凡子之伪，道为盛，兵及诸家次之。凡集，全伪者寡，而单篇别什借名窜匿甚众。于别编详之。”所论甚符合实际情况。又作者对各种书致伪的程度或真伪易淆的情况也有具体分析论辨，说：“大率秦汉以还，书若《三易》（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、《子夏》）、《三坟》、《六韬》、《七纬》、《关尹》、《子华》、《素问》、《洞极》、《李靖问答》、《麻衣心法》、武侯诸策、王氏诸经，全伪者也。《列御寇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通玄经》，真错以伪者也。《黄石公》、《鶡冠子》、《燕丹子》，伪错以真者也。《管仲》、《晏婴》、《文中》、真伪错者也。《元包》《孔丛》、《潜虚》，真伪疑者也。《鬻熊》，残也；《亢仓》，补也；《繁露》，讹也；皆不得言伪也。《素问》、《握奇》、《阴符》、《山海》，其名伪也，其书非伪也。《穆天子传》、《周书》、《纪年》，其出晚也，其书非伪也；即以伪乎，非战国后也。余亡足辩矣。”这种辨析，颇为细腻，其见解虽难称尽是，但大致是不差的。总之，胡应麟在辨伪学史上的地位，必须充分予以评价。《四部正讹》一书，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